

历史的记忆与悲壮的叙述

——论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

李直飞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摘要: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70周年到来之际,梳理对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以寻求新的写作突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伴随着远征军入缅作战就开始了,从最早出现的各种战地报道、纪实性文学作品到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的出现,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在不断地走向深入。这一书写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开启之后,作家们在历史还原和个体叙事两个维度之间深入展开,使这一段历史获得了新的文学意义。中国远征军作为一份厚实的文学书写资源,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有着巨大的挖掘空间。

关键词:中国远征军;文学书写;历史还原;生命体验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2)06—0044—06

2012年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70周年纪念。回顾这场70年前的战争,既有对战争硝烟惨烈的感慨,也有对战争本身的深刻反思。无论是对战争的感慨还是反思,首先表现出来的都是对战争的一种追忆,或者说是后来者对战争的一种叙述。对战争的叙述,其实就是叙述者对战争的价值判断,不同的价值立场和观察视点,带来了不同的战争叙述。而战争文学的书写,由于文学本身的特性,在纪实和虚构之间滑动,带来了战争文学极大的弹性空间。对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战争的特殊性(比如是现代中国军队第一次出国抗日作战,为保卫中国接受国际外援的最后一条通道,是中国军队与盟军合作的典范,属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争,同时又是影响着中华民族命运和世界战争格局的战争等等)带来了文学丰富表现的可能性,然而,纵观对这场战争的两次书写热(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都显得薄弱,与其在中国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符合。梳理之前的文学书写,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战争书写的启示。

有关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应该说从战争开始爆发就有了。1942年3月8日,日军攻占了缅甸首都仰光,切断了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路——滇缅公路。随后,为了保卫滇缅公路,中国10万远征军奔赴缅甸和英美盟军协同作战,联合抗日。在这10万远征军里面,除了不少善于文学创作的官兵,还有随军记者和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所具有的文学素养,使得从战争爆发之初国人就可以了解到战场的最新情况。最早对战争进行实况报道的是随军记者孙克刚。战争伊始,他就写出了题为《寇军发出的哀鸣》的战地快讯,发回重庆刊登于《中央日报》上,并印制出快讯,请指挥部在远征军各军师中散发,以鼓励士气。1946年他又出版了《缅甸荡寇志》一书,这是我国最早反映这场战争的纪实作品,以简洁生动的文笔描写著名的仁安羌之战、密支那攻守战等战事,揭示了日寇的凶残、顽固、残忍,也写出了中国军队奋死激战的情景。因书中附有三十余张极为珍贵的照片,如盟军指挥官史迪威由何应钦、卫立煌陪同在印度兰姆加尔基地检阅中国远征军、中国坦克部队追击争先逃窜的日军官兵、中国军队押解大批

收稿日期:2012-10-12

作者简介:李直飞(1983—),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10级博士研究生。

日军战俘离开战场的场面等。^[1]作为纪实性作品,内容真实可信,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且远大于文学价值。中央军校第16期毕业生黄仁宇,前任陆军14师排长及代理连长,1943年加入中国驻印军,1944年以新1军司令部上尉参谋职务参加第二次赴缅甸作战,在密支那战役中右腿中弹负伤,被战友抢救下来。这种亲身作战的经历使得他对战争有了更深的体验和对全局的准确把握,创作了《密支那像个罐头》等报告文学,记录了中国远征军会同美国军队,在密支那胜利地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况;1947年他又出版了反映缅甸战场雨季作战实况的《缅北之战》,这些都是对当时战地的真实写照。李明华的报告文学《野人山历劫记》,作者是一名女战士,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中国远征军增援缅甸,穿越野人山向印度转移时的艰辛惨苦的历程。值得一提的是,当1943年得知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牺牲的消息时,毛泽东写下了《五律·挽戴安澜将军》(1943年3月):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黑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竞殒命,壮志也无违。

毛泽东于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写的诗词,目前我们见到的,仅此一首五言律诗。^[2]在这首诗里,毛泽东概括了戴安澜将军率部奋勇杀敌的民族英雄业绩,深情地歌颂了戴安澜无违于报国壮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开启了共产党对远征军将士政治评价的先河。1944年加入远征军的诗人杜运燮,曾经写过诗歌《给永远留在野人山的战士》。尽管与穆旦的诗相比,该诗显得“调子明朗”^[3],被一些学者认为“内容单薄”,但说远征军的战士“建一座高照的灯塔于异邦”,“书写从没有人写过的史诗”,表现的却是诗人真挚的感情。在40年代对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中,具有最高文学价值的非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穆旦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莫属。

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弃教从军,作为杜聿明司令部随军翻译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战场。远征军出师不利之后,穆旦随军队经历了惨绝人寰的野人山战役及战败之后的大撤退。穆旦的好友、诗人王佐良曾作过如下描述:“但是最痛苦的经验只属于一个人,那是一九四二年的滇缅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想到人能这样疲倦,放逐的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援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青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着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之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饥饿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他活了下来,来说他的故事。但是不!他并没有说,因为如果我的叙述泄露了一种虚假的英雄主义的坏趣味,他本人对于这一切淡漠又随便,或者就连这样也觉得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4]这种迥异于常人的惨烈的生命体验在穆旦的内心深处沉积了三年,最后可谓“心中有物,良心所迫,不得不写”,^[4]使穆旦于1945年9月写下了长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诗歌以1942年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悲壮惨烈的撤退作为底色,以诗剧体形式,展开“森魅”与“人”的对话,诗中设定了三个角色,森林:代表一种如影随形、无法摆脱的死亡威胁,它的甜蜜而温柔的声调魅惑着生者进入它的怀抱;人:即牺牲的战士,面对死神的诱惑,坚持生的执著;葬歌:以宁静沉思的声音表达对逝者的悲悯和抚慰。^[5]这首诗最出色的是在即将跨越“黑暗的门径”,“把血肉脱尽”的时刻,直面战争和死亡,产生出灵与肉、生命与存在的辩驳,将“森林”和“尸骨”这种强烈刺激的感性体验,转化为升华苦难历程的思想,在带有朦胧象征的辩驳中隐含着对战争与和平、人类与自然、生命与死亡、永恒与瞬间、历史与现实的哲学沉思,很好地将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他把亘古的原始森林作为胡康河谷的英灵们个体生命的归宿地,以森林原始的和谐平息着牺牲者“血液里的纷争”,直至共同拥有“一个长久的生命”,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对来生的希望获得了对现世苦难的

某种规避和超越。这首诗被评论界称为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歌颂生命与永恒的代表作^[6],也成了书写中国远征军的经典之作。

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在正史中很少提及,几近湮没,对其的文学书写也几乎中断。进入80年代之后,政治化的历史观受到质疑与冲击,以民间的、个人的立场和话语解构正史,力图全方位地描述抗日战争历史,将被传统正史观“遮蔽”的历史重现出来的文学文本已不断出现。到了90年代,这种描述已成为新的抗日文学的基本主题模式和叙事模式,成为一种新的主导性话语。这种转变特别体现在那些描写国民党抗战史实的作品中,如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张笑天的《抗日战争》以及温靖邦的《虎啸八年》等长篇历史小说。而这时候,关于远征军的文学书写也又一次浮出了水面,邓贤的《日落东方》、《大国之魂》、章东磐《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和彭荆风的《挥戈落日》等纪实性作品以一种拨开历史记忆的方式重新开启了远征军文学书写之门。在这一股远征军的书写热潮中,“历史还原”、“元叙述”、“文体混杂”等成为了这股纪实性文学书写浪潮的关键词。开始之初,这种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在调查、访寻的基础上,就明显表现出一种“历史还原”的取向。所谓“历史还原”在他们这里包括了两层意思,首先是“现象还原”,即通过摈弃既往历史的谬误和非真实,还历史以本来的客观的面目。其次是“观念的还原”,即通过对偏狭政策、民族的超越,上升到一个更高更深厚更有现实感的人类精神的思想高度,重新评价历史,重新审视人性。为了提高作品的真实度,这些纪实文学在叙述学上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即“元叙述”的采用。“元叙述”也称“后设叙述”,是指作家作为叙述人直接登台亮相,通过种种露迹行为,戳穿叙述的假定性和逼真性,以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以“元叙述”为叙述手段的小说就被称作“元小说”,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纪实文学也可以被称为“元小说”。作为叙述历史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又在历史和文学之间滑动,导致了这些文学作品都是“文体混杂”的典型文本。与纯文学文本不同,在这些叙述当中,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新闻的种种特性水乳交融,不可离析。^[7]

因为有着还原历史情形,揭秘历史真相的意识,该时期的远征军纪实性文学书写大多呈现出一个全景式反映的构架。比如邓贤的《大国之魂》,作者不是孤立地表现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历史,而是把这一历史事件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上,以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的历程为主线,以中、缅、印大战历次战役为中心,同古保卫战、仁安羌解围战、野人山突围、松山攻坚战、攻克腾冲等战役,十万中国驻印军西出印度浴血缅甸,二十万中国远征军东渡怒江鹰战横断山麓,都写得波澜壮阔,惨烈悲壮,大体按事件发展的时空转换为序来建构全篇的基本框架。在这个基本框架内,作者又十分注意把写敌我双方与写盟军各方,写战略决策战争过程与写政治斗争外交活动,写国家元首、高级将领与写下级军官、普通士兵,写战争前线与写后勤支援等诸多方面,穿插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主有次、经纬交织的立体全景式结构。

随着纪实性文学作品崛起的,还有关于远征军的小说叙述也逐渐呈现出来。张廷竹的《黑太阳》、《酋长营》、《支那河》、《落日困惑》、《书生意气》等远征军系列小说和宗璞的《西征记》成了该时期远征军文学书写的亮点。在张廷竹的系列小说里,历史与真实已经让位于情感的渲染,远征军叙述也逐渐由全景向个体转换,作品着力于各色人物的塑造,通过自然的雄伟、人格的崇高及生命的悲壮等三大品位来显示出战争的悲剧。^[8]宗璞的《西征记》是一部非常独特的远征军题材小说。它描写的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在遭受了长期的日军轰炸,甚至在滇西战事吃紧、战争最需要的时候,走出校门,走向战场,参加远征军作战,用青春的热血践履“this is your war”的召唤。《西征记》并无意于书写荡气回肠的悲壮英雄,也无意于描写战争的宏阔壮大,而是着眼于塑造老战、陈大富、无名女兵、哈察明、吕香阁、苦留、福留、阿露等平凡人物的性格特征,这些人物虽然经历背景各有差异,但个个性情十足。宗璞的特别之处在于她自觉地和历史尤其是当下的历史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站在心灵站台上回望历史,不为写史,只为画像写人,通过写人将人物背后的时代环境娓娓道来。^[9]小说以知识分子视点切入战争,从知识分子面对战争选择时的“我在”到走进战争后的“我思”,通过亲历战争的两个主要知识分子视点反观二战、内战,反思战争、历史及人性,通过他们在战争期间的心灵感受和情感遭遇,来揭示战争的残酷和反人性,于战争叙事中既见人民、国家,还见人道、人性、人类,从而获得叙述的历史纵深感与饱含人道悲悯的宏

阔视野。在心灵挖掘的深度上,《西征记》成了新时期以来远征军文学书写的力作。

一个引人注意的新现象是,在远征军文学书写逐渐崛起的时候,远征军的影视叙述在 2000 年之后蓬勃发展起来。《生死千里》、《戴安澜将军》、《我的团长我的团》、《金凤花开》、《滇西 1944》、《飞虎群英》、《中国远征军》等剧陆续走红全国主流媒体。这些影视剧所反映的价值立场和叙述角度都足以给后来的远征军书写提供可资借鉴的地方。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以 1942 年国民党派出中国远征军协助缅甸抵抗日军侵略的历史为背景,剧中对国民党军队的形象作了较为客观的描绘,不回避国民党对抗战的功绩,给国民党军队一个正面的历史评价。这与以往传统大陆剧大相径庭,被认为是大陆第一部比较真实反映国民党军队形象的历史题材片。而在叙述角度方面,《中国远征军》以一个虚拟的中等职务的团长韩少功作为叙述的主角,这样一个中层军官,上联系着关系战争全局的高层指挥,下联系着冲锋在最前线的下层士兵个体,既能对战争全局进行关照,也能反映出战争状态下下层士兵的生命状态以及中层军官的丰富心理。《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个人记忆的形式进入历史,其实就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新重述,其鲜明的个人记忆痕迹随处可见,流贯于始终。这种个人记忆既是一种写作方式,也是想象和重述历史的角度,是一种个人视角中的历史图景,生动可感而又主观性极强。与其说这是一部历史剧,不如说是一部对历史的个人想象之作,传统历史写作及叙述中被压抑的“民间叙述”与“个人体验”在这种个人回忆录式的追述中得到了充分而淋漓尽致的释放。

纵观中国远征军 70 年以来的文学书写,中国远征军文学书写出现了实事求是、历史还原和文学想象并存,宏观国家叙事和个体体验写作同在的现象,而当下的大多数作品还属于历史还原的纪实性作品。像中国远征军这样的战争题材的文学书写,长期以来,都拥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大部分这类小说在表现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全民族抗战历史的文学作品时,所选取的正面主角往往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往往充当配角甚至反面角色,处于一个对立的角度,作品中的人物褒贬泾渭分明。这类遮蔽甚至违背历史的文学图式在 50 到 60 年代的抗战小说中极为普遍。这种从政治层面上来书写战争,其主要的着墨点往往不在“战争”,而在于政治意义上“正义”或“非正义”的区分上,其作品的文学艺术性也不再是追求的主要目标,变成了如何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在这种叙事的传统格局下,近年以来的包括远征军在内的战争文学的历史还原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以《大国之魂》为代表的纪实文学作品赋予了历史以新的图景,随着掌握的史料丰富性增多,引用了之前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大国之魂》涉及到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就达几十名,以相对客观的历史眼光表现国民党将士在抗日战争中的真实活动,以期达到对历史本原的“接近”,使得这类作品更加真实可信,同时也赋予了这类作品可以用民族的和世界的眼光观照历史。由于远征军出国作战的特殊性,远征军出国作战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联盟联合作战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书写远征军的纪实性文学作品既写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法西斯盟国同法西斯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也写了反法西斯盟国内部中、英、美等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清晰地再现了历史的合力对历史的促进作用。这种全面的世界的眼光拓展了作家的艺术表现力,也为人们重新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较为可信的历史画卷。

而在另外一个层面,研究者经常以“苦难深重”来指称现代中国的现实,但一个同样屡屡被谈及的悖谬现象是:这种苦难深重的现实并未在世人内心投射下足够深挚的烙印。或者说,它留下了深挚烙印,但同时又容易被“胜利”等等宏大的历史目标所冲淡。反映在文学表现中,基本症候即是:深挚的悲剧作品与悲剧精神明显不足,苦难现实与个体实存境遇之间缺乏足够深挚的对应,个体之实存感受往往让位于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10]但战争首先是个人体验的加入,战争作为文学书写的题材,“更关注更迷恋的内容,则是人或人类在战争中的处境,并于此而发现其中所蕴藏的有益于文明与进步的思情寓意,甚至是那种难以言传但可以领略陶冶的精神境界”^[11]。因此,对于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来说,作家所做的努力应当是在一种探求历史的努力当中,最大限度地以心灵去“接近”历史本原的精神遨游,达到一种对人的生存世界的审美的凝神观照。40 年代穆旦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和近期宗璞的《西征记》在这方面作出了出色的开拓。他们对远征军的文学书写不再仅仅局限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更关注个体在战争中的生命感受,意味着对历史的正视与重构,以心灵激活历史。特别是在穆旦那里,战争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苦难的体验,更被视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生命思考,获得了一种美学与

哲学意义上的超脱,从而提高了书写的深度与高度。

应该说,对于远征军这类“后战争”文化的书写中,“战争”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看,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其内含的意识精神、文化形态已经超越了时空,具有延续和永恒之特征。战争固有的基本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在当代虽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它内含的某些精神意识,显示的人类本性等等,仍然作用于当代社会复杂的文化构建中,并与文学想象产生互动。^[12]在这个意义上,远征军题材获得了无尽的书写空间,新时期的远征军文学书写就是在不断更新和颠覆旧的历史记忆中注入对人性的深度开掘,而不仅仅是忠诚地还原历史事件本身。陈思广在谈及当代战争小说时提出当下战争小说创作的一大局限在于“拘泥于历史过程及事件本身的意义,未能保持必要的‘距离’并给予美学的审视,即所谓入得了史而出不了史,小说成为历史事件的仓库,作家本人也在不知不觉充当了仓库的‘保管员’”^[13]。这里所指出的战争文学创作的局限在对远征军的文学书写中也是表现得相当明显的。除了穆旦的诗和宗璞的小说等少数优秀之作外,当下对远征军的叙述多数还处于追求“历史本原”的状态。在这种“历史还原”中,比如《中国远征军》等追求对于外在宏大战争场面的书写。这种宏大场景的书写自然可以给读者以瞬间的视觉冲击和阅读快感,但是冲击和快感之后却很难给人以心灵震撼,因为这些作品缺少向内的精神探索和情感挖掘。^[13]这种向内的精神探索和情感挖掘,显示出来的就是心灵的激荡,对人性的终极关怀,不仅是对战争中狭隘民族观念之下的悲壮叙事,不仅是对战争正义与不正义之争,更不是凭借暴力美学去冲击人们的感官,应该是对战争、生命的一种哲学玄思,是对人性的审美关照,只有达到了这种境界,远征军的文学书写才能显示出它的厚重,也才能说对远征军的书写走向了成熟。

面对着远征军这一丰厚的文学题材,创作中还存有相当多的空白点等待作家们去挖掘。尽管当前存在的作品有着这样那样的缺憾,但作家们显然在沿着因历史而人的多方位的思辨与体悟的路上走着,在对人的哲学以及历史哲学进行着执着探索和不懈努力。这使人们看到了中国远征军文学书写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身影,看到了中国远征军文学作品迈向成熟的希望,看到了这类书写有可能攀上新高峰的诱人前景。

参 考 文 献

- [1] 刘亦实.《缅甸荡寇志》作者之谜[J].文史春秋,2005,(12).
- [2] 黄泽佩.庄重情深的颂歌——谈毛泽东《五律·挽戴安澜将军》[J].安顺师专学报,1998,(1).
- [3] 李光荣.抗战文学的别一种风姿——论西南联大文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2).
- [4] 李续亮.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J].云南档案,2005,(4).
- [5] 穆旦.致唐振湘[A].穆旦诗文集(2)[Z].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6] 钱理群主编,吴晓东点评.20世纪中国文学名著中学生导读本·诗歌卷[C].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 [7] 支宇.历史还原·元叙述·问题混杂——邓贤长篇纪实文学研究[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5,(10).
- [8] 张艺声.民族圣战文学的悲剧意识——评张廷竹抗日系列短篇小说[J].台州师专学报,1995,(5).
- [9] 张志忠,李坤,张细珍.长篇小说《西征记》笔谈[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7).
- [10] 易彬.“滇缅公路”及其文学想象[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4).
- [11] 周政保.战争小说的审美与寓意构造[J].文学评论,1992,(3).
- [12] 杨亦军.“战争”之历史与当代、延续与永恒——关于后战争时期的文化与文学的当代思考[J].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4).
- [13] 陈思广.当代战争小说创作观念反思[N].文艺报,2008-08-03.

Historical Memory and Solemn and Stirring Narrative—the Literary Writing on Chinese Expeditionary Army

Li Zhif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I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review the literary writing on Chinese Expeditionary Army for seeking a new breakthrough in writing in the coming of 70th anniversary Chinese Expeditionary Army into the Burma to against Japan. The literary writing on Chinese Expeditionary Army started very early as war broke out. It went into depth from field reports, on – the – spot literary works to MuDan’s *Forest Charm—Offering Hu Gentle on Bone*. Writers’ historical reduction and individual narrative made this period of history won the new literary significance when restarting the writing in the 1980s. Chinese Expeditionary Army as a thick literature writing resources has huge mining space in breadth and depth.

Keywords: Chinese expeditionary army; literary writing; historical reduction; life experience